

“解冻文学” 与1950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坛 ——
以《译文》为例 = “Thawed literature” and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50s :
using Yi Wen as an example

崔峰 Cui Feng

2018

Cui, F. (2018). “解冻文学” 与1950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坛 —— 以《译文》为例 = “Thawed literature” and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50s : using Yi Wen as an example. 中国现代文学, 33, 143-170.

<https://hdl.handle.net/10356/83282>

© 2018 中国现代文学学会.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aper was published in 中国现代文学 and is made available with permission of 中国现代文学学会.

Downloaded on 21 Jul 2024 22:39:50 SGT

「解凍文學」與 1950 年代的中國大陸文壇 ——以《譯文》為例*

崔峰**

摘要

作為 20 世紀 50-60 年代中國大陸唯一一份公開發行的專門譯介外國文學作品的期刊，《譯文》是當時中國大陸人民瞭解、認識外國文學作品、文藝動態的最主要的管道之一。通過對這份國家級外國文學刊物的研究，可以深入探討當時中國大陸文壇以及文學翻譯如何受到政治及時代社會因素所影響。1950 年代上半期，蘇聯文壇發生重大變革，「解凍文學」開始出現。《譯文》亦開始出現對「解凍文學」的譯介。受「日丹諾夫主義」及「雙百方針」的不同影響，《譯文》在其發展階段呈現出對「解凍文學」不同的譯介策略。本文將把中國文壇對外國文學的介紹與翻譯納入 1950 年代的社會政治環境中進行考察，探討「解凍文學」在《譯文》譯介過程中的「多舛」命運。

關鍵詞：解凍文學，《譯文》，1950 年代，譯介，政治環境

*本論文的部分寫作內容獲得新加坡教育部項目 AcRF Tier 1 Project RG147/16 (NS) (Translation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1950s and 1960s: its Significance to Modern Translation Studies)的資助，包括資助作者在倫敦大學學院（UCL）查閱英美外交機構的解密資料。兩位匿名評審對本文寫作提出寶貴建議。特此一並致謝。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博士，講師。

“Thawed Literature” and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50s: Using *Yi Wen* as an Example

Cui Feng^{***}

Abstract

In the 1950s and 1960s, *Yi Wen* 译文 (Translated Literature) was the only official journal in China dedicated to the publication of translated foreign literature. Hence, *Yi Wen* helped the Chinese gain exposure to and develope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rends. The study of this national literary journal facilitat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how socio-political conditions influenced the Chinese literary landscape during the period. The emergence of Thawed Literature in Russia was a result of the revolution in the Russian literary scen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50s. It was also during this period that *Yi Wen* began publishing translations of Thawed Literature for the Chinese audience. Due to the influences from Zhdanovism and the Double Hundred Policy, varie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were employed at different stages of *Yi We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apricious fate of Thawed Literature in *Yi Wen*'s translation processes by placing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against the socio-political background of 1950s China.

Keywords: Thawed Literature, *Yi Wen*, 1950s, Translation, Political environment

^{***} Ph.D., Lecturer, Chinese Programm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1953年，由中國作家協會（簡稱作協）主辦、時任文化部部長的茅盾擔任首任主編（1953—1959）的《譯文》創刊。1959年，《譯文》更名為《世界文學》，由曹靖華擔任主編，至1966年「文革」前夕停刊。14年間，《譯文》（《世界文學》）共發行134期，其中共計850位譯者發表了多達131個國家和民族的1432位作家的作品；譯作數量共計3177篇。作為1950—1960年代中國大陸唯一公開發行的專門譯介外國文學作品的刊物，通過對《譯文》這份期刊的研究，我們可以深入探討在特定的文化空間中譯者翻譯行為的文化目的及其為此而作的翻譯上的處理，並觀察譯入語文化多元系統內詩學（poetics）與意識形態（ideology）的關係、專業人士（the professionals）（主要包括批評家、評論家、教師、譯者等）與系統外的主流觀念及贊助人（patronage）之間的關係。本文將以1950年代《譯文》發展的第二階段（1956年4月號-1958年7月號）對蘇聯「解凍文學」的譯介為例，考察其在譯入語語境中的「多舛命運」，進而探討翻譯、文學與政治間的關係。

一、該階段「解凍文學」作品譯介情況縱覽及問題的提出

1950年代中期以前，由於中國大陸對在各領域實施對蘇聯「一邊倒」政策，使得中國的民族意識、對自身國家地位的定位呈現出一種弱化的態勢。但是，隨著中國社會建設的不斷推進，以及對「蘇聯的經驗、情況、歷史發展」由「不甚瞭解」到「有些瞭解」，¹中共領導層開始覺察到了「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²。同時，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的召開，對史達林的評價及如何與西方共處等問題，使得中蘇出現分歧，³再加上「波匈事件」的爆發，更是直接促使了中共領導人懷疑精神與獨立意識的明顯增強。從「以俄為師」到「以蘇為鑒」，中國開始了尋求自身建設發展之道的全面反思。這種對民族國家意識的反思開始在當時的外國文學譯介中被不斷言說。表現在對蘇聯文學的譯介方面，一方面，中蘇友好的話語建構並沒有被打破，這一時期《譯文》對蘇俄文學的譯介數量仍然遠超過對其他國家文學作品的譯介。但另一方面，配合著本民族意識的反思，對蘇俄文學譯介的實質性內容開始發生變化。而同時，因民族國家意識的突顯，擺脫蘇聯教條主義束縛的要求和對自身發展之道的尋求而產生的「雙百方針」，為當時的中國知識份子、文壇帶來了一陣「早春天氣」。意識形態在《譯文》第一階段（1953年7月號-1956年3月號）文學譯介擇取中所處的強勢主導地位，在此時，即《譯文》第二階段（1956年4月號—1958年7月號）出現了相對弱化的態勢。

受「日丹諾夫主義」的影響，《譯文》第一階段對蘇聯「解凍文學」思潮的譯介較為零散，頗引人著目的是在1953年12月號愛倫堡的論文〈談談作家的工作〉、1954年5月號奧維奇金的特寫〈區裡的日常生活〉，以及1955年8月號迦林娜·尼古拉耶娃的小說〈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由於當時社

¹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368，370。

²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23。

³ 關於這方面的論述可以參考 John Gittings. *Survey of the Sino-Soviet Dispute: A Commentary and Extracts from the Recant Polemics 1963-196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59-61. 另外，在中蘇分歧公開化之後，中方亦出版《分歧從何而來？——答多列士等同志》（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一書，梳理了雙方主要在蘇共20大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分歧。

會主義意識形態話語的巨大影響力，為部分「解凍文學」進入中國文壇提供了可能。無論是對「日丹諾夫主義」一類文學作品和文學理論的譯介，以及對資本主義文學的排斥，還是少量「解凍文學」的引入，《譯文》對譯作的擇取標準很大程度上是出於與蘇聯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及其階級觀念上的同一性。可以肯定的是，雖然當時「解凍文學」的思潮和部分作品被譯介入中國文壇，但在當時這種思潮及其作品對中國文壇的影響相當有限。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蘇聯「解凍文學」思潮的出現，一個直接的導火線即是史達林的逝世及隨後產生的蘇共政壇對史達林個人權威的質疑。因此，「解凍文學」的核心理念——「干預生活」、「反映真實」，就直接與史達林個人權威體制下所產生的「粉飾生活」（歌頌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和天才的領袖人物）及「無衝突論」針鋒相對。這與 1940 年代以後，中共體制內所建立的毛澤東個人威權體制及對中共領袖的極度崇拜的政治環境，明顯格格不入。⁴

從 1956 年 4 月號的《譯文》開始，「解凍文學」便正式登上了中國翻譯界的譯介舞臺：包括蘇聯「解凍文學」的其他一些重要作家的主要代表作被介紹了進來；「解凍文學」的數量較之第一階段，有了明顯增多；最為重要的是，這一階段的「解凍文學」不再如前期一般扮演配角，它們的出現因為契合了當時譯入語環境中社會、政治、文化的發展需要，而扮演了重要角色。

首先，我們縱覽這一階段哪些「解凍文學」的代表作家、作品或思潮、觀念，在什麼時間被介紹了進來。

關於文學作品的譯介方面。

1956 年 10 月，《譯文》連續刊載了米·左琴科的〈火災〉、〈不同的真實〉和〈不平常的事故〉。在蘇聯戰後的文藝整風運動中，左琴科等人曾是被日丹諾夫直接點名批評的「市儈」、「為藝術而藝術的謬論的典型」。在 1948 年受到批判之後，左琴科便鮮有作品問世。但是這 3 篇發表在蘇聯 1956 年 6 月的《涅瓦》雜誌上的「近作」依然繼承了左琴科 50 年代以前的創作風格和文藝觀念，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作者在〈不同的真實〉中，通過描寫漁夫批評詩人寫「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指出「粉飾生活」是「很遺憾的缺點」。⁵

左琴科的複出與當時蘇聯文壇「解凍文學」思潮的出現息息相關。他與阿赫瑪托娃⁶等一些曾經遭到批判的作家也在當時相繼恢復了名譽，他們的作品重新得以出版。以蘇聯當時的短篇小說創作為例，1950 年代中期，特別是史達林去世之初，「解凍文學」現象剛剛在蘇聯文壇出現之時，史達林時代遺留下來的塑造「正面」、「偉大」人性的文學創作要求，及像性描寫等一些史達林時代的禁忌仍居於蘇聯文壇的突出地位，但蘇共當局已經可以容許作家們創作負面的、不引人注意的人物，及塑造英雄個人形象（以區別於原先對英雄人物群體形象的塑造）。作家開始介入創作過程中，其宣揚無目的性、疏離感、悲觀論，都得到了官方認可。⁷這些現象均意味著「日丹諾夫主義」在當時的蘇聯文壇中開始被清算。

1957 年 4 月號《譯文》刊載了肖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這篇小

⁴ 關於《譯文》發展第一階段，「解凍文學」的譯介情況可具體參考崔峰〈「日丹諾夫主義」與 1950 年代上半期的中國文壇——以《譯文》為例（1953 年 7 月號—1956 年 3 月號）〉，見王宏志主編《翻譯史研究 2011》（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283-290。

⁵ 米·左琴科著、張孟恢譯，〈不同的真實〉，《譯文》1956:10（1956.10），頁 53。

⁶ 有關阿赫瑪托娃的文學創作經歷（主要是詩歌創作）可以參見 Deming Brown. *Soviet Russian Literature since Stal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25-29.

⁷ Deming Brown. *Soviet Russian Literature since Stalin*, 149.

說開 50 年代後半期和 60 年代蘇聯衛國戰爭題材作品之先河，受到當時蘇聯評論界和廣大讀者的關注和好評。在衛國戰爭時期和戰後初期，蘇聯作家們主要從為國建功的角度來反映衛國戰爭。50 年代中期，他們從英雄主義和為國建功的激情逐漸轉向對於戰爭更為深刻的思考。〈一個人的遭遇〉是這類作品中的第一部。小說以人道主義為指導思想，突出人民在戰爭中的磨難和犧牲，表現個人在戰爭中的悲劇。此後，出現了許多從新的角度反映衛國戰爭的作品，被稱為「戰壕真實派」。⁸

1957 年 11 月、12 月合集中，列昂諾夫的〈俄羅斯森林〉的部分章節被刊載。這部小說以表現蘇聯高級知識份子中新舊思想的鬥爭為主題，作者「對人物的心理作了極深刻細膩的描寫，善於從哲學的高度揭露人物心靈深處的活動」⁹。小說因深刻反映蘇聯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在廣度和力度上遠遠超過了先於其問世的〈區裡的日常生活〉，因而對「無衝突論」給予了極大衝擊。隨著這部小說的問世和奧維奇金派的崛起，「無衝突論」在蘇聯文學中很快失去了市場。正如作者所言：「正是對俄羅斯森林命運的思考，對人與自然、人與歷史這一主題的思考，促使我構思和寫出了〈俄羅斯森林〉這部小說。」¹⁰作品因其深刻的哲理性 and 密集的思想性而被稱為社會哲理小說的典範，從〈俄羅斯森林〉開始，蘇聯文學中形成了社會哲理小說流派。¹¹

1958 年 5 月號《譯文》刊載了「解凍文學」期間嶄露頭角的作家巴維爾·尼林的中篇小說〈認識了季什科夫〉，作品中「作者把一個忠心耿耿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先進人物和一個因循拖遝無能的官僚主義分子描寫得相當生動。」¹²同時，本期「編者的話」專門還提到了尼林的長篇小說〈殘酷〉，指出它「在蘇聯讀者中間頗得好評」¹³。事實上，〈殘酷〉正是尼林在「解凍文學」期間寫出的一部重要代表作，因為對蘇聯肅反機構內幕的大膽反思，而在蘇聯文學史上佔據一席之地。

其次，再來觀察文藝理論或文學觀念的介紹方面。

1955 年 12 月，蘇聯「共產黨人」雜誌第 18 期發表了以「關於文學藝術中的典型問題」為題的專論後，蘇聯的報刊上就陸續出現了多篇討論典型問題的文章。1956 年 5 月號《譯文》刊載了其中的兩篇，即布希明的〈論藝術誇張〉與那查連科的〈別把孩子連同污水一起潑去〉。前文指出對藝術的理解要「建立在客觀地、審慎周詳地分析具體的藝術現象上」，反對對藝術誇張理解這樣「一種不正確的傾向」。¹⁴

第二篇文章則承接〈論藝術誇張〉的觀點，並從「誇大無罪」與「關於逼真」的角度做了進一步的「確切說明」¹⁵。如果我們將此兩文再聯繫到 1956 年 2 月 15 日大陸《文藝報》所刊出的「關於文學藝術中典型問題」專論全文，並將之與《譯文》1953 年 9 月號〈蘇聯文學中的典型性問題〉相比較，就知道當

⁸ 譚得伶，《譚得伶自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203。

⁹ 〈譯後記〉，見《譯文》1957:11-12（1957.11-12），頁 279-280。

¹⁰ 劉甯，〈「今天的作家應當成為哲學家」——列昂諾夫訪問記〉，《世界文學》2（1987），頁 283-284。

¹¹ 譚得伶，《譚得伶自選集》，頁 198-202。

¹² 「編者的話」，見《譯文》1958:5（1958.5），頁 200。

¹³ 同上。

¹⁴ A·布希明著、幾希譯，〈論藝術誇張〉，《譯文》1956:5（1956.5），頁 183。

¹⁵ 那查連科著、胡祥譯，〈別把孩子連同污水一起潑去〉，《譯文》1956:5（1956.5），頁 183、185。

時蘇聯文壇關於「典型問題」的討論所具備的相當強的針對性了。奧澤羅夫那篇強調文學中的黨性、並運用日丹諾夫的觀點來解釋文學創作中典型性問題的論文，直接受到了 1952 年 10 月蘇共「十九大」「總結報告」的影響，此報告中大談典型問題「任何時候都是一個政治性的問題」，典型是「與一定社會歷史現象的本質相一致的」¹⁶。而在蘇共要「二十大」，及「解凍文學」思潮出現後的蘇聯文壇，再重拾文學中的典型性問題，顯然在觀念上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

《文藝報》刊載的這篇「專論」中，已經明確地推翻了黨性對文學中典型性的決定性作用這一觀點，承認人們曾「忽視極其豐富多采的具體藝術材料，而去硬搬諸如此類的現實公式。」¹⁷

由此總結，蘇聯文壇對文學典型性觀念的重大轉變，即是要探索文學發展的客觀規律，讓典型的事物脫離抽象的概念，創造「藝術的、具體感性的形象」¹⁸；既要同「粉飾現實的做法作鬥爭」，也要「不墮入另一個極端——培植藝術創作中的平淡無味和一片灰色的現象」¹⁹。

1956 年 12 月號上，《譯文》又刊載了奧澤羅夫的另一篇論文〈思想與教條〉。作為一名曾經的「日丹諾夫主義」宣揚者，奧澤羅夫在這篇文章中重新思考文藝與政治、文學創作（尤其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與教條主義之間的關係，對奧維奇金、尼古拉耶娃等人的反對粉飾現實的小說和特寫表示了讚許。²⁰

此外，1957 年 2 月號，《譯文》在「世界文藝動態」中介紹了「蘇聯文藝界熱烈討論弗拉基米爾·德米特裡耶維奇·杜金采夫的『不僅僅為了麵包』」。介紹中談到這部小說「內容偏重在批評缺點，作品中寫的官僚主義者，刻劃得相當生動。」²¹

但是，對〈不僅僅為了麵包〉的評價在蘇聯文壇經歷了一個由褒至貶的過程，同時，該書還於 1957 年 8 月在中國文壇以「黃皮書」的形式出版，開了中國因政治原因而內部出版蘇聯小說的先河。

縱觀「解凍文學」思潮在《譯文》這一階段的發展過程，值得我們思考的是：為什麼在 1956 年以後，《譯文》及中國文壇會開始大量譯介「解凍文學」作品（包括文藝觀念）？為什麼在 1957 年後，《譯文》對「解凍文學」作品譯介的數量和頻率，較之於 1956 年出現了明顯的下降趨勢？為什麼中蘇文壇對〈不僅僅為了麵包〉的評介會出現一個由褒至貶的過程？這一現象在整個蘇聯「解凍文學」思潮的變化中具有怎樣的意義？為什麼在中國的「反右」大潮中，對「解凍文學」出現意識形態的抨擊時，依然出現了〈俄羅斯森林〉和〈認識了季什科夫〉兩部「解凍文學」作品？

二、問題的解決：「解凍文學」的譯介與「雙百」方針的實施

雖然在《譯文》發展的第一階段內，已經有少量「解凍文學」的代表中

¹⁶ 陳建華，《二十世紀中俄文學關係》（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172。

¹⁷ 蘇聯「共產黨人」雜誌專論〈關於文學藝術中的典型問題〉，《文藝報》3（1956），頁 45。

¹⁸ 同上，頁 46。

¹⁹ 同上，頁 51。

²⁰ 奧澤羅夫著、張化鵬譯，〈思想與教條〉，《譯文》，1956 年 12 月號，頁 167-168。

²¹ 〈蘇聯文藝界熱烈討論杜金采夫的「不僅僅為了麵包」〉，《譯文》1957:2（1957.2），頁 192。

被譯介了進來；但同時，也存在著許多「解凍思潮」中重要作品、事件在當時中國文壇的「缺席」。例如，作為「解凍文學」早期最為重要代表作之一，「揭開了蘇聯當代文學序幕的作品」²²《解凍》在當時並沒有譯本²³——在蘇聯文學「幾乎獨占中國譯壇」的1950年代前半期，「各大出版社都在爭搶蘇聯作品選題，凡有一些名氣的蘇聯作家的作品幾乎都翻譯過了，以致屢屢『撞車』，同一本書出版了不同的譯本」，但著名作家愛倫堡的《解凍》卻出現了「沒有人『搶譯』，沒有出版社『搶出』」²⁴——其根本原因顯然是《解凍》所刻意彰顯的人道主義精神以及對小人物命運的關注不符合當時譯入語的譯作擇取規範。此外，1954年底的蘇聯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中發生的爭論，也沒有在中國得到較全面的介紹。這一期間，也沒有報導曾被開除出蘇聯作家協會、被日丹諾夫批判為「蕩婦」的阿赫瑪托夫恢復了作協會籍；沒有報導蘇共「二十大」上肖洛霍夫猛烈指責作家协会會員有一大批「死魂靈」、「糟粕之作卻堆積如山」²⁵；沒有報導1955年對一批在1930年代後被批判、清洗的作家的「平反」，因而也就更不會提及布林加科夫、阿赫瑪托夫、茨維塔耶娃等作家作品的重新出版和發行——但這一情況的改變顯然在1956年10月《譯文》發表「平反」作家左琴科的作品上體現了出來。

這些現象的「缺席」，與當時中國立足於本民族國家政治、經濟形勢發展的需要而做出的擇取有關，也與當時中蘇意識形態的同一性這一對文學譯介的主導因素所產生的作用有關。

1956年中，「雙百」方針的問世也為當時的中國文壇帶來了一股強勁的「春風」，包括廣大作家和翻譯家在內的中國知識份子迎來「早春天氣」。進入高潮時期的蘇聯「解凍文學」思潮正契合了「雙百」方針實施之下中國文壇的新環境。對蘇聯「解凍文學」作品、文藝觀念的翻譯與介紹，及其對中國文壇產生的重大影響，也就在此時成為題中應有之義了。

在1956、1957年間，一批在題材、主題、風格和藝術方法上呈現變化和革命的作品不斷在刊物上出現，這些作品或体现了要求文學向「藝術」回歸、開掘「個人生活和感情空間」、維護「對個體的生活和情感的價值和獨立性」這

²² 黎皓智，《20世紀俄羅斯文學思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10。

²³ 《解凍》第一部發表於斯大林逝世後的1954年。1956年作者又發表了第二部，進一步描述蘇聯社會「解凍」後春天的到來。《解凍》出現也標誌著前蘇聯五、六十年代「解凍」文學時代的到來。筆者認為，《解凍》這部作品具有「符號」意義，過於鮮明的反應了文學對社會的批判性作用。正因為此，在中國1950年代上半期是不可能被翻譯進來的，因為當時毛澤東出於對新生的中共政權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鞏固是不會讓《解凍》翻譯過來的。《解凍》譯文於1955年秋發表在發行量很少的《國際展望·和平月刊》中文版上，而且是分四期連載的，影響力微乎其微。即使到了1956年「雙百」期間，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有所鬆動，但由於《解凍》對蘇聯社會產生了巨大沖擊力，所以當時的中國翻譯界為了穩妥起見，也不太敢把這部具有明顯象征意義的作品以單行本推出或發表在重要期刊上，以免在中國社會產生巨大的反響。這是當時的中國文藝界所不敢承擔的風險。畢竟，中國社會與當時的蘇聯有所不同，斯大林已經去世，而且蘇聯社會對斯大林展開的批判。但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仍然被牢牢掌控在毛澤東手中。「雙百」期間，中國翻譯界翻譯的蘇聯「解凍文學」都沒有愛倫堡的《解凍》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力巨大，所以被翻譯到中國以後，可能出來的政治風險也就小很多。《解凍》後來還以「內部出版」的形式（「黃皮書」）出版，即沈江、錢成譯《解凍》（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

²⁴ 王誌龍，〈《解凍》喚醒了我心中的人道主義〉，見向繼東主編《新啟蒙年代：我的80年代閱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頁132。

²⁵ 洪子誠，《1956百花時代》（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10。

一趨向²⁶，或「要求作品更多承擔揭發時弊、關切現實缺陷的責任」，「加強創作的社會政治干預」²⁷：

前一種趨向反映在對域外文學作品的擇取時，開始由原先作品所需背負的政治意識或對其進行意識形態的解讀，開始轉向對作品審美、詩學意義的思考與探索。後一種趨向，則顯然受到了蘇聯「解凍文學」相關思潮的影響。最明顯的例證就是當時中國文壇同樣提出了「干預生活」、「積極參與生活」的口號。〈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區裡的日常生活〉、〈被開墾的處女地〉等幾部發表在《譯文》上的譯作受到當時廣泛關注。²⁸同時一些中國作家當時創作的一批反映生活矛盾衝突的文學作品，如劉賓雁的特寫〈在橋樑工地上〉等在選擇和主題上也明顯受到這些「解凍文學」的影響。

首先，特寫這種體裁已在當時的蘇聯文壇廣泛運用²⁹。「日丹諾夫主義」時期的蘇聯文壇，認為特寫的功能在於向讀者「表現出我們偉大的國家，社會主義已經取得勝利的國家，是在怎樣地建設和改造著」。³⁰但是，隨著蘇聯文壇對粉飾文學和「無衝突論」文學的批判，及「解凍文學」高潮的出現，對特寫及其功能的認識也發生了變化。「解凍文學」思潮期間，運用特寫這一手法進行創作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即是奧維奇金和他的〈區裡的日常生活〉。奧維奇金說：「特寫的這樣一種機動性和敏捷性，就使它可以幫助黨做另外一件事，即跑到很遠的生活深處起偵查兵的作用。」³¹1954年4月，《人民文學》首篇以粗體字的形式刊發了〈在橋樑工地上〉一文。主編之一的秦兆陽在按語和「編者的話」中借用奧維奇金「偵查兵」這一說法評論和極力推薦此文：「我們十分需要『偵查兵』式的特寫」³²，「我們期待這樣尖銳提出問題的、批評性和諷刺性的特寫已經很久了，希望從這篇〈在橋樑工地上〉發表以後，能夠更多地出現這樣的作品。」³³中國作家們的〈在橋樑工地上〉及其隨後而來的一股特寫之風，顯然受到奧維奇金這一創作手法的啟發。³⁴當然，這部作品的重要意義不僅僅在於它是中國文壇「干預生活」小說的源頭之作，它更成為1957年在「事情發生變化後」，「干預生活」這類作品被稱作「逆流」的「罪魁禍首」。從〈在橋樑工地上〉到〈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對這類作品的「重新認識」，也就直接與「解凍文學」在中國命運的轉折息息相關。

「解凍文學」在「雙百」期間的譯介經歷，讓我們看到了在當時這樣一個短暫出現了意識形態多元化的語境下，「知識並不一定要優先於翻譯活動，翻譯

²⁶ 洪子誠，《1956 百花時代》，頁 92。

²⁷ 同上。

²⁸ 1956 年第 3 號的《文藝報》上，以「勇敢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衝突」為題，記錄了當年 1 月 21 日，中國作協小說組，針對〈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區裡的日常生活〉、〈被開墾的處女地〉第二部頭幾章「由於在蘇聯引起的爭論和我國被推薦為青年讀物，更被我國讀者熱烈討論」這一現象，所召開的討論會的情況。（《文藝報》，1956 年第 3 號，頁 21。）

²⁹ 《譯文》所刊載的第 1 篇蘇聯文學「特寫」是華倫丁·奧維奇金著、冰夷譯〈區裡的日常生活〉，見《譯文》1954:5（1954.5），頁 1—38。

³⁰ 伯里斯·波列伏依著、李相崇譯，〈論特寫〉，《譯文》1953:8（1953.8），頁 123—124。

³¹ 瓦·奧維奇金，〈談特寫〉，《文藝報》7（1955），頁 36。

³² 「編者的話」，《人民文學》4（1956），頁 126。

³³ 「編者按」，《人民文學》4（1956），頁 1。

³⁴ 1954 年，奧維奇金隨蘇聯新聞代表團訪問中國時，即是由劉賓雁擔任代表團的俄文翻譯。1956 年 4 月初，劉賓雁訪問蘇聯、東歐，應邀到奧維奇金在庫爾斯克的家中作客，二者進行了直接交流。（洪子誠《1956 百花時代》，頁 96）

活動本身即是在進行知識創造的過程」³⁵。在這當時，這種「知識創造」既表現在「解凍文學」如何影響了中國讀者對文學作品的理解，也表現在中國作家受「解凍文學」的影響，創造出不同于以往詩學風格的作品來。譯者、作家和政治家共同參與了政治與政治的權力活動（powerful acts）中，創造了知識、形塑了文化。

三、問題的再出現：1957年後《譯文》對「解凍文學」譯介數量、頻率的急劇下降

但是，「解凍文學」在《譯文》上的譯介過程並非想像中的「一帆風順」。我們從上文對「解凍文學」的概覽中可以注意到，《譯文》對「解凍文學」思潮的譯介主要集中在1956年，該年分別4月號、5月號、10月號、11月號、12月號對「解凍文學」的作品進行了譯介與評論。那麼到了1957年後，1956年末《譯文》對「解凍文學」連續譯介的勢頭戛然而止，只是在1957年中的4月號與年末的11、12月合刊，及1958年中的5月號出現了零星譯介。那麼，為什麼「解凍文學」的譯介數量和頻率會突然在1957年後的《譯文》上呈現出急劇下降之勢？觀察這一現象可從1956年11月21日到12月1日，中國作家協會專門召開的一次「文學期刊編輯工作會議」中看出端倪。

這次會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成立以來，第一次專門就文學期刊的工作問題所召開的會議。會議目的就是配合對「雙百」方針以後，中國文學藝術領域出現的活躍現象這一時代契機，「作為文學創作和文學評論的主要園地的文學期刊，……如何正確地在刊物上貫徹執行這個方針，以推動文學事業進一步發展和繁榮。」³⁶會議反復談到「雙百」方針提出以後，文學刊物應該起著什麼作用。大家普遍達成的一個共識是，「各個文學刊物應該大膽放手地實行這一方針，敢於發表不同意見、不同觀點的文章，敢於發表不同風格、不同題材、不同形式的作品。」並且特別提出，「尖銳地批評生活中的缺點的文章和作品，只要不是惡意的誹謗，就應該發表。要真正做到『大膽放手』，就先得解除刊物自身的一些束縛。」³⁷

在這次會議中提出的一些主張裡，最引人注意的方面即是從1957年1月1日起作協所辦刊物實施「定期自給」、「計畫虧損」的「企業化」模式，以「促進刊物之間的自由競賽」³⁸。

首先要肯定的是，這種所謂「企業化」的措施，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可以刺激期刊在更改刊物名稱、變換裝幀等經營方式上有所改變、突破，甚至變革，以獲得在「自負盈虧」的情況下，盡可能地追求利潤最大化。同時，這些期刊通過將刊載作品的體裁、題材多樣化，以期擴大讀者對象的範圍。在1956年4月《譯文》的那份「本刊讀者意見綜述」中，編輯部就已經令讀者為其代言道：「『譯文』不要把讀者物件局限于文藝界，作為全國唯一介紹外國文學的刊物，

³⁵ Maria Tymoczko and Edwin Gentzler. *Translation and Power*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and Teaching Press, 2007), p. xxxiii.

³⁶ 本刊記者，〈辦好文學期刊，促進「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藝報》23（1956），頁20。

³⁷ 同上。

³⁸ 同上，頁21。

它的對象應該是廣大青年，廣大人民群眾。」³⁹並且意識到「文學體裁不夠多樣，這是『譯文』的嚴重缺點之一」⁴⁰。當然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與1950年代中期以前，盲目學習蘇聯、主要譯介蘇聯文學作品，以及「日丹諾夫主義」和「無衝突論」對中國文壇的深刻影響是分不開的。文學作品體裁、題材、表現手法的單一化勢必會造成讀者面的狹窄。就像有讀者對《譯文》所希望的那樣，要「多登些特寫、政論、小品文、戲劇、遊記、諷刺文學、兒童文學、民間故事、寓言、童話等等體裁的作品」、「劇本太少，希望酌量增加」，「希望刊物更廣泛地介紹各種不同題材的作品，以便反映我們這個時代世界各國人民的豐富多采的生活」。⁴¹

在《譯文》第一階段總共32期內，有23期（即1953年7月號至1956年3月號，《譯文》在1953年7至9月號、1954年1至3月號、1954年5月號、7月號至10月號、1955年7-8月號、1956年3月號）出現了小說（含特寫）、詩歌、論文「三分天下」的局面，甚至在《譯文》創刊後長達9個月的時間內所刊載的122篇譯作中，只包含了這種三種體裁的作品。但自1956年4月號上，《譯文》首次出現了對寓言詩的譯介後，無論是從譯介數量還是刊載頻率上，開始經常性地發表戲劇、故事、隨筆、回憶錄、書簡、小品等其他體裁的作品，「三分天下」的局面被徹底打破，在第二階段共28期內，僅僅在1956年10月號、1957年7月號和1958年7月號出現了僅對小說、詩歌或論文譯介的情況。

但是，需要我們清楚看到的是，這種「企業化」的管理方式，絕對不意味著經營模式的完全「市場化」。也就是說，雖然在一定的空間內，這些期刊要承擔起「自負盈虧」的責任——這種「市場化」經營方式下的表現形式，通過做出有限地調整來取悅讀者；但是，這些期刊的經營方式沒有，也不可能做到完全以市場為導向。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首先，這些期刊仍然屬於中國作協及其各個分會主辦，再加上1956年之前，共產黨就已經建立起統一的出版發行管道，原先的出版社均已通過「社會主義改造」為國有出版社。這些情況即使在「雙百」方針提出之後，也沒有任何改變。創辦和實行變革的這類刊物，其廣義贊助人仍然是「國家」，從編輯部人選的安排，到具體文章的刊載，仍然要符合一定的社會政治的「規範」。期刊不能自給的部分，還是要由國家來補貼。因此，這種「企業化管理」根本不可能改變這些期刊「國有」的性質，也就更談不上完全按照市場操作的規則來進行經營運作了。正如在這次「文學期刊編輯工作會議」上，雖然大家一方面強調「大膽放手」，但同時也明確地提出：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絕對不是要我們把思想鬥爭的旗幟收起來，而是要把它舉得更高。我們的刊物必須站在先進的立場、黨的立場上成為宣傳先進思想、先進事物、先進藝術的陣地。⁴²

由此足見，在這樣一個由中國作協主辦的會議上，這位「贊助人」實質上早已規定好了各家期刊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則，以及它們變革時的基本底線。即使是《譯文》在廣泛譯介「解凍文學」之時，也仍然要注重那些具有社會主義戰鬥性與思想性作品的譯介——這在編輯部或譯者在介

³⁹ 「譯文」編輯部整理〈本刊讀者意見綜述〉，頁193。

⁴⁰ 同上，頁194。

⁴¹ 同上，頁194—195。

⁴² 本刊記者，〈辦好文學期刊，促進「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頁20。

紹譯介作品的內容和做價值判斷時就已明顯地表述了出來。

從這次「文學期刊編輯工作會議」中，中國作協為新形勢下，期刊工作變革所規定的要求裡，我們就可以逐步瞭解為什麼 1957 年後，以《譯文》為例，對「解凍文學」的譯介急劇降溫，甚至還出了針對「解凍文學」中的重要作品〈不僅僅為了麵包〉而內部出版的「黃皮書」。

事實上，陸定一在 1956 年 5 月那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已經代表共產黨高層就規定了知識份子和文藝工作者們發表「自由」的範圍，和「放」與「鳴」的限度：「我們所需要的，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文藝」；「我們所主張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人民內部的自由。」⁴³正是因為遵循社會主義制度這一原則與底線的存在，使「干預生活」的主張與創作一開始就在中國文壇上面臨著巨大壓力。這一原則，也就為 1957 年的「反右」和「反修正主義」鬥爭的爆發埋下了伏筆。《人民文學》作為 1956 年至 1957 年提倡、推廣「干預生活」文學特寫、並發表了一系列相關作品的「始作俑者」，到了 1957 年 10 月轉載了李希凡等人的批評文章，批評《人民文學》是 1956 年以來文學創作中「反黨逆流」的「代銷的市場」，⁴⁴而《人民文學》自己也開始正式檢討「所犯錯誤的嚴重性」，表示願意「徹底改正錯誤的決心」。⁴⁵這種《人民文學》批評與自我批評，不僅意味著深受「解凍文學」影響的「干預生活」的文學創作在當時中國文壇的終結，也清楚地預示了以表現「矛盾和衝突」、揭露生活「陰暗面」的蘇聯「解凍文學」在譯入語環境中的必然命運。果不其然，在 1957 年，尤其是 1957 年 6 月份「反右」正式拉開序幕之後，真正在《譯文》名義上出現的有代表性的「解凍文學」重要作品，只有 1957 年 11 月、12 月號上刊載的從列昂諾夫〈俄羅斯森林〉中選譯的一章。

四、「解凍文學」的衰落：以《俄羅斯森林》第六章為例

值得注意的是，1957 年末正是「反右」鬥爭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當中國「干預生活」的文學創作因為受到批判，而幾近「絕跡」之時，如何解讀此時在《譯文》上出現的一部蘇聯「解凍文學」的重要代表作？

首先，評價一部「解凍文學」作品如何表現生活與人物間的「矛盾與衝突」等特點，往往是在對一部完整作品的閱讀基礎上做出的整體性判斷。如果僅僅選取其中的某個章節，閱讀效果勢必與作品的整體特色有所不同。

先從作品所反映的時代背景來看，《譯文》此時所選取的〈俄羅斯森林〉中的片斷（即第六章）以一段最具政治安全性的時代背景、一段社會主義陣營內最令人追憶和推崇的「光榮歲月」——「十月革命」前後作為敘述背景，而非常巧妙地回避了「解凍文學」中針對當下生活，特別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社會政治現象進行「干預」和「揭露」的時代性。

再從所擇取的作品內容來看，西方讀者及很多蘇聯讀者對這部小說「真正感興趣之處應在於對反面人物的塑造」：在一個知識份子充分享有自由，以及人際關係相互和諧的環境下，格拉齊安斯基的學術能力得到賞識，地位青雲直上，紅極一時；小說中，隨著情節的發展，其傲慢，無知，自私，投機革命的

⁴³ 陸定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頁 10、12。

⁴⁴ 孫秉富，〈批判「人民文學」七月號上的幾株毒草〉，見《人民文學》，1957 年 10 月號，頁 32。

⁴⁵ 「編者的話」，《人民文學》1957:10 (1957.10)，頁 29。

本質顯露出來，並最終走上了自殺的道路。⁴⁶雖然在第六章中出現了這位在原作中佔有重要地位的「反面人物」格拉齊安斯，但若僅以第六章的閱讀視野為限，對格拉齊安斯的集中描寫僅一次，除了「絮絮叨叨、一字一板」地發表了一段「(森林)是俄羅斯國家經濟的取之不盡的搖錢樹」⁴⁷之類的觀點外，絲毫未見對其思想經歷發展、性格特徵變化的描寫。作者的主要筆墨幾乎都集中在正面人物維赫羅夫身上。格拉齊安斯在這一章中所起到的作用，即是以一個「思想落後」的反面角色來襯托維赫羅夫「質樸的性格和高貴的品質」⁴⁸。雖然格拉齊安斯、柴列吉洛夫等反面角色的「出場」確實讓我們看到了揭露社會不良現象這一「解凍文學」的特徵之一，但是由於本章充斥了大量對維赫羅夫戀愛經歷的回憶，而沖淡了本應突顯的正反角色在對待國家森林問題上的衝突這一主題。

同時，本章中在描寫維赫羅夫對格拉齊安斯等人觀點的批駁與反對時，也缺乏對雙方交鋒場景的直接刻畫，而多採用大段心理描寫以反映維赫羅夫所思所想。從某種程度上講，這種描寫方式並沒有很好地體現出「解凍文學」直面矛盾、不加以回避的處理方式；從而在主題揭示的效果上淡化了對如何利用國家森林資源這一問題的緊迫性與尖銳性。也正是基於這一點，我們可以注意到，作者在第六章中並不是要引導讀者對俄羅斯森林的利用問題展開更深層次的思考，更不是試圖要解決正反雙方存在的矛盾。本章中，我們更多看到的是維赫羅夫在心理、言語層面對格拉齊安斯等人的反對態度。這一點，顯然與前文提及的其他刊載完整的「解凍文學」作品有所不同，無論是〈不需要的榮譽〉中馬拉霍夫與妻子的矛盾及妻子的農莊主席職務被取代，還是〈米特裡奇〉裡給米特裡奇扣上「反革命」帽子的村蘇埃維主席蘇奇科夫被最終撤職，這類「解凍文學」作品都在直面矛盾的過程中提出了解決矛盾的方法。由此，我們可以分析得出，在〈俄羅斯森林〉的第六章中，作者的寫作方向即是單純塑造一個思想進步的知識份子形象。而這樣缺乏正面、尖銳的矛盾衝突的描寫，則使作品在人物塑造方面的藝術表現力略顯單薄、在作品主題的揭示方面也不夠深刻。作品的重點完全或單一地傾向於對一個形象高大的先進人物的塑造上，從而突顯了作品在思想意識形態上的教育意義。

因而，可以想見，作為《譯文》的讀者，當〈俄羅斯森林〉在當時中國還未出現全譯本的時候⁴⁹，對如此片斷的閱讀效果，顯然不可能與閱讀整部〈俄羅斯森林〉相同。這種有意識的擇取已然不能完全反映出「解凍文學」的重要特點。

其次，〈俄羅斯森林〉這一章節出現在 1957 年 11 月、12 月《譯文》的「蘇聯文學專號」上，以此來配合紀念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四十周年。當時，不僅僅是《譯文》，幾乎所有報刊都出版了特刊，出現了 50 年代最後一次譯介蘇聯作品的高潮⁵⁰。這也就進一步解釋了《譯文》擇取〈俄羅斯森林〉中「十月

⁴⁶ Victor Terras,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Era of Socialist Realism, 1925-53,"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edited by Charles A. Moser. New York: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92, p.514.

⁴⁷ 列·列昂諾夫著、劉遼逸譯，〈俄羅斯森林〉，見《譯文》1957:11-12 (1957.11-12)，頁 269。

⁴⁸ 「譯後記」，見《譯文》1957:11-12 (1957.11-12)，頁 280。

⁴⁹ 〈俄羅斯森林〉的第一部中譯本為董長斌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查明建、謝天振：《中國 20 世紀外國文學翻譯史·下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頁 854。）

⁵⁰ 陳建華，《二十世紀中俄文學關係》，頁 184。

革命」片斷的重要用意——對〈俄羅斯森林〉的介紹實際上是為了配合國家對外政治文化交流的需要，而並非要以此在「反右」大潮中「逆水行舟」。

再者，列昂諾夫的個人資歷也顯示其具有「過硬」的政治資本及在蘇聯文壇極其「正面」的作家形象。列昂諾夫曾是受到高爾基表揚過的作家⁵¹，在衛國戰爭時期，他寫了諸多充滿愛國熱情的政府文章和一部獲得史達林獎金的劇本〈侵略〉。因而，列昂諾夫作品中所反映的「進步正確」的思想意義及其受到高爾基的讚揚，可謂為其在蘇聯文壇上安上了一把「政治正確」的「雙保險」。因而，1940年代後期，當蘇聯文壇處於整肅知識份子的「日丹諾夫運動」中時，列昂諾夫安然無恙。1957年，〈俄羅斯森林〉又被授予了列寧獎金。因而，當1957年中下旬，中國國內的「反右」鬥爭又出現了「向蘇聯文藝看齊」的口號，國際上正值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四十周年，為了在文學話語中營造中蘇表面上的友好關係，政治方向正確、沒有任何政治「污點」、享有較高文學聲譽的列昂諾夫及其作品便順理成章地出现在了《譯文》上。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譯文》有意擇取〈俄羅斯森林〉的部分章節，並非要突顯其作為蘇聯「解凍文學」代表作的重要意義；僅僅從選擇的部分來看，「解凍文學」的主要特點已經被深度淡化。從這一層面來看，《譯文》對譯作的安排依然配合了「反右」過程中，在本國文壇上對「干預生活」同類體裁作品的消滅趨勢。

此外，導致中國「反右」鬥爭以至於影響到「解凍文學」在中國文壇的命運急轉之下的另一個導火索就是發生在1956年末的「匈牙利事件」。作為仍然堅定地執行社會主義路線的中蘇兩國來講，面對如此嚴峻的「冷戰」態勢，進一步加強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控制必是題中之義。從而「使蘇共二十大以後的解凍天氣再度變冷，使非斯大林化暫停了」⁵²；《共產黨人》社論更直接把匈牙利事件同文藝自由化的後果聯繫起來⁵³。1957年初，蘇聯文藝界開始了「反對不健康傾向」、「反對修正主義」、反對揭露陰暗面的批判運動，一些具有社會批判指向的作品被受到批評。〈不僅僅為了麵包〉就是其中一例。這部「或多或少直接觸及了官僚體制下的權力濫用現象」⁵⁴的小說，在1956年《新世界》發表時受到一致肯定，被認為「作者在竭力遵循俄羅斯古典文學的傳統，特別是果戈裡傳統」⁵⁵。但是到了1956年底和1957初，它就被作為「不健康傾向」的代表作進行了批判。⁵⁶中國文壇迅速捕捉到這一資訊，同年8月，以「黃皮書」的形式出版該作（當時的譯名是〈不是單靠麵包〉）。事實上，這部小說成為一部供內部參考和批判使用的讀物，不僅僅是因為它在蘇聯受到批判，更為重要的是，書中對於社會主義官僚體制的揭露同樣被當時中國「反右」的政治環境所不能容忍。〈不僅僅為了麵包〉在蘇、中兩國先後被打入「冷宮」的相同命運，恰恰表明了「反修」與「反右」鬥爭中，兩國文藝界對「資產階

⁵¹ 「譯後記」，見《譯文》1957:11-12 (1957.11-12)，頁279。

⁵² 穆薩托夫著、李祿譯，〈蘇聯與匈牙利事件：新的檔案資料〉，《近現代史》1 (1993)，轉自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812/17/7449569_139909584.shtml。

⁵³ 李明，〈蘇聯五十一六十年代中期的文藝政策及其對文學創作的影響〉，《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1984年第2期，頁56-57。Geoffrey Heskl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Search of New Way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p.531.

⁵⁴ Andrew Baruch Wachtel and Ilya Vinitsky. *Russian Literature*, pp.236.

⁵⁵ 〈蘇聯文藝界熱烈討論杜金采夫的「不僅僅為了麵包」〉，頁192。

⁵⁶ 李明濱，〈蘇聯五十一六十年代中期的文藝政策及其對文學創作的影響〉，《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 (1984)，頁56。

級文藝破壞社會主義路線」的現象具有相同的警惕性和在理論、方法上的相似點；都通過誇大階級鬥爭的嚴重性，將文藝領域的問題最終以政治宣判的方式來解決。尤其是蘇聯「反修」過程中的一些觀念又對中國「反右」鬥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1957年8月底，《真理報》以〈文學藝術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聯繫〉為題，發表赫魯雪夫在5—7月間的講話；9月份，《人民日報》即全文刊載，為中國的「反右」擴大化提供了理論依據。因此，中國的文藝界又出現了「向蘇聯文藝看齊」的口號和「蘇聯文學加強了我們的思想武器」等提法。

五、結論：問題的引申——「反修」浪潮與「蘇聯文學專號」

當1957年後，意識形態批判的大旗被重新高揚，中國文壇再次「向蘇聯看齊」之時，蘇聯文學的譯介又呈現怎樣的特點？中國文壇「反修正主義」的浪潮究竟對「解凍文學」產生了怎樣的衝擊和影響？

1957年第30號的《文藝報》借紀念「十月革命勝利四十周年」之機，刊載了郭沫若〈向蘇聯文藝看齊〉的答記者問。針對「國內外修正主義者都力圖貶低近20年蘇聯文學的偉大成就，否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⁵⁷這一問題，郭沫若說：

修正主義事實上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那是資本主義的理論。主張修正主義的人，他們強調個人主義的自由，反對黨的領導，否定在黨領導下的一切成績……

在今天要進一步加強兩國之間的交流，在我們就要進一步加強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在文學藝術上多多創造出在道德性和藝術性上都有高度價值的作品。這樣的作品……蘇聯一定會多多介紹過去。⁵⁸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1957年中國文壇對蘇聯文學在1950年代的最後一個譯介高潮的出現，除了因為要配合當時繼續存在、但已顯空洞的「中蘇友好」話語的建構之外，更為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由於諸種國際、國內的因素，中蘇兩國領導人對起始於蘇聯國內，並深刻影響至中國文壇的「解凍文學」思潮，做出了階級意識形態的政治宣判。而使得兩國政壇及其影響下的文藝界，都面臨著清除「反馬列主義」、「反社會主義」「逆流」這一共同問題。無怪乎郭沫若會說道：

毛澤東主席的文藝講話和蘇聯文學的方針政治是完全合拍的，最近我們讀赫魯雪夫同志「文學藝術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聯繫」的講話，受到很大的啟發。兩個講話的主要內容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⁵⁹

就在如此政治環境及受其影響的文藝觀念、文學關係的主導之下，《譯文》於1957年11月、12月號上刊載了「蘇聯文學專號」，成為《譯文》在1950年代對蘇聯文學的最後一次大規模、集中性譯介。

「專號」中首先發表了曹靖華的文章〈蘇聯文學——我們的鼓舞者，感謝

⁵⁷ 郭沫若，〈向蘇聯文藝看齊〉，《文藝報》30（1957），頁2。

⁵⁸ 同上。

⁵⁹ 同上。

你！）。曹靖華的文字包含了兩個層面的意義，一是應景之語；二是追求現實目的。

先來看第一個層面。這期「專號」表面上的目的，正如它在第一頁上的粗體大字所示，即「慶祝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四十周年」。所謂「應景」就是配合對這一活動的紀念，以及與之相關的中蘇友好話語的建構。⁶⁰既然是一份紀念性的刊物，那麼對蘇聯革命史、文學發展史的回顧必不可少，更要提到在過去幾十年內，中國文學如何受到蘇聯文學的影響。因此，文中有相當多的篇幅是在稱頌蘇聯文學「在世界文學史上揭開了嶄新的光輝燦爛的一頁」⁶¹，並且回顧了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解放後」等不同歷史階段裡，蘇聯作家和文學作品對中國文學的巨大影響。據統計，自 1956 年末以後，中蘇友好的話語建構已經開始出現淡化趨勢。⁶²此時中蘇友好話語在實質內容上已顯得非常空泛。這段發展過程，在《譯文》對蘇聯文學的譯介上就體現得很明顯。如果說 1953—1956 年間，第一階段的《譯文》對反映蘇聯社會主義經濟、文化、軍事建設的成就，及其體現出來的「高、大、全」式的「先進」人物進行了壓倒性的譯介外，這類題材的作品在第二階段的《譯文》中就已經很少見到——這期的「蘇聯文學專號」體現得尤為明顯，表現在：

首先，應景式地發表了高爾基、阿·托爾斯泰等作家反映當年中蘇革命情形或「十月革命」對作家影響的文字。高爾基的〈致中國的革命作家們〉（戈寶權譯）是高爾基在 1934 年 9 月 2 日在莫斯科大會大廈舉行的中國革命作家晚會上的致辭，向當時取得勝利的中國紅軍表達祝賀。該致辭展現出一個可以將文學和語言當作武器的中蘇革命作家同盟的友好場景。譯者戈寶權在「譯後記」中寫道：「時隔 20 多年，但在今天讀起來，它對我們中國作家們還仍然具有著非常深刻的意義。」⁶³雖然譯者並沒有進一步揭示出他所認為的「意義」體現在何處，但至少將蘇聯文學史上最重要的「無產階級作家」高爾基的文字作為這期「蘇聯文學專號」的開篇譯作，即表現出《譯文》以非常「高調」的姿態對中蘇友好關係的應和。至少在表像上，當時的中蘇作家延續了 20 年前兩國作家團結、友好的關係。可以說，高爾基的這篇致辭為本期專號譯介蘇聯文學的主旨定下了基調、營造了氛圍。

為了進一步烘托這種氛圍，「專號」隨即安排了多達 47 首的「蘇聯詩選」，在譯作數量上佔據了「專號」譯作總數的 71% 強。可以說，由於詩歌本身短小精煉，再加上社會主義國家在提倡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寫作手法的同時，對歐美現代派詩歌藝術手法的排斥，使得這類詩歌在創作手法上多呈現出直抒胸臆、語言淺白的特點，在主題上多需要表現對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歌頌——如此，

⁶⁰ 1957 年 11 月，毛澤東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活動。（彼得·鐘斯、西安·凱維爾著、郭學德、朱耀先、黃飆譯：《中蘇關係內幕紀實（1949—1984）》[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4]，頁 15—17。）

⁶¹ 曹靖華，〈蘇聯文學——我們的鼓舞者，感謝你！〉，《譯文》1957:11-12（1957.11-12），頁 5。

⁶² 一方面，中蘇友好話語建構的頻率明顯降低，像《中國青年》、《中國工人》、《中學生》等全國性的、負擔著思想教育任務的刊物就呈現出這種趨勢。報紙也不例外，《人民日報》1955 年刊登了約 200 篇有關介紹蘇聯和中蘇友好的文章及消息，1956 年則減少到 100 篇左右。而在內容介紹方面，從 1953 年以前對蘇聯的全面介紹，到 1953—1956 年間側重于講蘇聯經濟和科技方面的經驗與蘇聯對中國的「無私」援助。到 1956 年以後，中國開始反思對蘇聯全面學習的政策，有關蘇聯方面的經驗介紹已經相當稀少。（參見李巧寧《新中國的中蘇友好話語構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頁 64—65。）

⁶³ 「譯後記」，《譯文》1957:11-12（1957.11-12），頁 13。

詩歌即成為營造氛圍、調動情感的最佳體裁。所以，可以想見的是，為了單純營造一種友好、團結的「節日」氛圍，「蘇聯詩選」中絕大多數詩作都是內容籠統空泛，但又極具感染力的「頌歌」，為應景當時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提供了極為豐富的情感表現。這類對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和領導者直抒胸臆的頌歌式的詩作，與當時《人民日報》刊登的中國作家對蘇聯熱烈頌揚極其相似。語言的樸素、淺顯、直白，「英雄」、「幸福」、「歡樂」、「光榮」、「熱愛」、「偉大」等用以宣洩情感的關鍵字的反復與鋪陳，是這些譯作與當時中國文壇自己創作的詩作的共同特點。

其次，在這期的「專號」中，反映蘇聯國家建設成就的小說僅一篇楊諾夫斯基的〈市集上〉。不僅如此，在整個《譯文》發展的第二階段，以集體農莊為背景的小說由第一階段的 8 篇銳減至 2 篇，即 1956 年 11 月號的〈米特裡奇〉和 1958 年 6 月號的〈割波里葉村的瑪莎〉。而〈米特裡奇〉還是一部暴露農莊建設問題的「解凍文學」作品。

應該看到，在 1950 年代中期，當中國社會開始反思蘇聯的建設模式，並力圖尋找自我發展之路時，曾在《譯文》第一階段被作為重點譯介內容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題材類的作品在《譯文》第二階段的「流失」實是情理之中。這類題材的作品之所以在第一階段「風光無限」，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即在於它們契合了當時中國社會向蘇聯學習的「時代性」，並成為中蘇「蜜月」期間，在文學話語上反映兩國經濟建設密切交往的「見證」。但是，一旦中蘇關係僅存在表像上的、多以言語形式建構起來的團結景象，而缺少經濟建設等實質性的交流時，這種作品的「時代性」也就隨之而逝，已經不再適合作為該階段《譯文》的譯介重點。惟有本身並不具備時代特徵的「戰爭與革命」，在此時成為兩國交往過程中的共同「記憶」。因而，「專號」在擇取小說內容時，也就非常自然地把握取的「觸角」延伸至反映蘇聯早期革命情景的作品：在 6 篇小說中，除了已經提及的〈市集上〉及〈俄羅斯森林〉外，剩下的 4 篇小說有 3 篇即反映了這一譯介趨勢，即費定的〈列寧的素描像〉、馬雷什金的〈攻克達伊爾〉及庫茲瑪·巧爾納的〈偉大的心〉。

再來看曹靖華文字所述的另一個層面：對現實目的追求。需知「十月革命」勝利四十周年正值蘇聯「反修」、中國「反右」的政治浪潮中，這是曹靖華和《譯文》無法回避的政治現實。與郭沫若一樣，曹靖華同樣印證了在當下的政治、文藝風暴中，「毛澤東主席的文藝講話和蘇聯文學的方針政治」的「完全一致」：

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談到我們的文藝是為什麼人的時候，就引證列寧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中的話說，我們的文藝應當「為千千萬萬的勞動人民服務」。

四十年來，蘇聯文學，尤其是革命導師列寧的關於文學的指示和蘇共中央歷次關於文學藝術的決議，以及重要的文學理論著作，對中國革命文學的發展，給了極寶貴的啟示和深遠的影響。它成了我們前進的路標，它武裝了中國作家，在歷次同資產階級的反動文藝思想鬥爭的時候，能夠粉碎敵人，取得重大的勝利。⁶⁴

我們可以看出曹靖華將蘇聯文學置於「戰勝資產階級反動文藝」的功能之下，

⁶⁴ 曹靖華，〈蘇聯文學——我們的鼓舞者，感謝你！〉，頁 7。

這正與當時中國文壇將受蘇聯影響的「干預生活」的文學作品，視作資產階級文藝的「逆流」不謀而合。這也就使蘇聯文學順理成章地成為中國「反右」鬥爭的武器。曹靖華在文章最後的總結也就一語道破了當時重提學習蘇聯文學的實際意義：

目前，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正在勝利地進行著保衛黨原則，保衛社會主義文藝事業，保衛社會主義方向的反右派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我們將從我們的先行者——光輝的蘇聯文學中，吸取更大的力量，來徹底粉碎右派，獲得更大的勝利。⁶⁵

因此，在這期「蘇聯文學專號」中，刊載一批能體現蘇聯文學對中國「反右」鬥爭現實意義的作品亦在情理之中。直接能反映這種現實意義、強調文學階級性的作品，除了在「短論」中有阿·托爾斯泰的〈馬克思主義豐富藝術〉（秦順新譯）以及傑米揚·別德內依的〈談革命作家的責任〉以外，最耐人尋味的處理方式則出現在「蘇聯文學四十年」專欄中。

「蘇聯文學四十年」是一個旨在回顧蘇聯文學歷史的專欄，其目的是想「在迎接十月革命四十周年這個意義重大的紀念日的時候……按照歷史順序來回憶一下蘇維埃文學的發展」⁶⁶。

關於「歷史再現」的問題，王宏志曾言：

歷史是一種論述……在講述這過去的故事時，（歷史學家）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受到很多內在和外在的因素所影響及支配，他會運用不同的論述策略，對歷史材料進行篩選和詮釋，從而對歷史事件進行講述及解釋，建構一個更大的歷史圖像來。這樣的歷史圖像往往具備了更積極的現實意義，它可能跟當前的政治現實、國家論述、國民教育，以至整個社會和文化結構等表面歷史事件沒有直接聯繫的事物緊密掛鉤。⁶⁷

總之，任何歷史的寫作或敘述只是從當下作者的研究視角出發，而非具有普世的標準意義或時空上的永恆性。我們注意到，對一元化政權而言，「權威一旦獲得，就必定能夠找到某種穩固和有用的、過去的依據」⁶⁸，而「帝國統治的持久性不僅需要軍事的保護，而且也需要歷史學和追憶的保護」⁶⁹。而在蘇俄語境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法，首先表現在參照今天和我們有關係的那些問題來闡釋過去的事件：表現在對於我們今天必須意識到的那些事件的選擇上。」——這正是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的元老季莫菲耶夫所定義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目標。

在譯入語境中的《譯文》正是通過蘇聯文學對歷史和現在的重新闡釋這一視域，建立起譯入語境中「充滿自信心的新型闡釋」⁷⁰。

這一點，我們在觀察這期「蘇聯文學四十年」的專欄就可以有所體會。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蘇聯文學四十年的發展過程中，不可能只出現一條線索、一

⁶⁵ 同上，頁 11。

⁶⁶ 德魯津著、呂潔譯，〈二十年代〉，《譯文》1957:11-12（1957.11-12），頁 355。

⁶⁷ 王宏志，《歷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頁 6。

⁶⁸ John H. Plumb, *The Death of the Pas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9), p. 41.

⁶⁹ 埃娃·湯普遜著，楊德友譯《帝國意識：俄國文學與殖民主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180。

⁷⁰ 同上，頁 180-181。

種聲音、一種流派、一種文藝觀念的發展模式。這樣一種多層面、多角度、立體式的發展過程，就對「回憶」這段歷史帶來多種敘述方式的可能。由誰來敘述？從什麼角度去敘述？為什麼要這樣敘述？都是需要我們考慮和解決的問題。

首先，我們來考察這一專欄中幾篇主要文章的出處。德魯津的〈二十年代〉出自 1957 年 7 月 6 日的《文學報》；普霍夫的〈三十年代〉出自 1957 年 9 月 5 日的《文學報》；蘇爾科夫的〈永恆的光輝〉出自 1957 年 10 月 15 日的《文學報》。我們可以看到對蘇聯幾十年文學歷史的回顧，並沒有選取在當時的歷史年代中所出現的文章，所有這些文章都是從當時最新刊發的蘇聯官方雜誌中摘錄的這些作家的近作。這一現象所帶出來的問題就是，這種從當下出發，講述「過去的故事」時，敘述者很有可能會受到「內在和外在的因素所影響及支配」，它所敘述的「歷史圖像」就可能與當時的「政治現實」、「國家教育」等因素聯繫起來。以此，我們可以觀察到〈二十年代〉一文中，突出那些在革命初期，就能看出「事件的真正本質」⁷¹的作家們，他們「瞭解並且善於描寫黨的領導作用和組織作用，描寫共產黨員——人民群眾的引路人」⁷²，而站在他們反面是就是「充滿了無思想性和非政治傾向的『綏拉皮翁兄弟』」⁷³。文中多次提到「描寫正面人物、描寫革命時代新人的問題被提到首要的地位」⁷⁴，並且不忘提醒讀者注意「只有克服了敵對勢力的頑強抵抗，社會主義才能獲得勝利」⁷⁵。

如果說「二十年代」的革命之初，還存在著作家們對「革命的理解是分歧」⁷⁶的話，那麼「三十年代」則反映了「一個偉大時代的全部特徵」——「社會主義制度勝利地確立，就使大多數文學家變得最積極擁護黨的政策了。愈來愈多的作家站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旗幟下來了。」⁷⁷文中尤其強調了在這一階段「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基本原則」⁷⁸的確立，提到了在這一時期出現的表現「作家積極干預生活的特寫……充滿著布爾什維克黨性」⁷⁹。

最後，解放戰爭時期的蘇聯文學被視作「永恆的輝煌」⁸⁰，作者「邀請」那些在 1956 年「解凍風氣」裡「傷了風」的作家朋友們回到這個代表「永恆輝煌」的戰爭年代裡去「旅行旅行」。⁸¹

我們可以注意到，所刊載的 3 篇文章名義上各自獨立成篇，實質上安排在同一個專欄之下渾然一體。這些文章從頭至尾都貫穿著一條線索，即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傳統以及發展過程。並最終歸結到它們所要反映和解決的現實問題：「解凍」思潮中出現的「傷風」現象，文學作品對社會主義原則的「反動」——這一當時蘇聯文壇「反修正主義」的核心問題。因此，以此線索貫穿反映「蘇聯文學歷史」的諸篇文章，也就契合了當時蘇聯「保衛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運動。而在蘇聯的影響下，中國文壇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

⁷¹ 德魯津著、呂潔譯，〈二十年代〉，頁 356。

⁷² 同上。

⁷³ 同上，頁 357。

⁷⁴ 同上，頁 358。

⁷⁵ 同上。

⁷⁶ 同上，頁 356。

⁷⁷ 普霍夫著、沈江譯，〈三十年代〉，《譯文》1957:11-12 (1957.11-12)，頁 362。

⁷⁸ 同上。

⁷⁹ 同上。

⁸⁰ 蘇爾科夫著、呂琴、冰潔譯，〈永恆的光輝〉，《譯文》1957:11-12 (1957.11-12)，頁 369。

⁸¹ 同上，頁 380。

接受也從「雙百」期間對典型性問題、「真實性」、「干預生活」等問題的討論與反思，重新轉向了以意識形態與政治思想為指導原則。

可以說，解凍文學「干預生活」小說從被推崇到被貶為「逆流」，這裡反映了中蘇文壇中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是政治性還是藝術性的爭論過程，最終成為周揚所總結的是一場「兩者不可調和的世界觀」⁸²之爭。在一個文學的命運幾近完全由政治操控的環境下，這場爭論的結果必然是以政治宣判的方式宣佈思想政治、意識形態的原則壓倒藝術性原則。特別是關於「寫真實」這一核心觀念的爭論，從剛開始應不應該「寫真實」的討論，變成後來的「什麼是真實」和「作家、藝術家是站在什麼立場和抱著什麼目的來描寫真實」的問題，⁸³實質上也就是前文所提及的「生活中的矛盾和衝突」究竟是什麼的問題。

當周揚對「真實性」的理解變成：

在他們⁸⁴眼中，似乎只有揭露陰暗面的作品才是「真實的」，而「歌頌光明面」的作品都是「粉飾現實」的，「不真實的」。他們的所謂真實就是那種消極的、落後的、停滯的、死亡著的東西，他們不能或者不願意看到作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一切生氣勃勃的、強有力的、沸騰著的、前進著的東西，不能或者不願意用革命的、發展的觀點來觀察社會主義的真實，否認革命的浪漫主義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真實，否認革命的浪漫主義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方面。⁸⁵

此時，一切從文學藝術的層面去爭辯「真實性」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都已顯得多餘。當「社會主義」的政治意義和重要性被不斷放大的同時，必然導致「現實主義」被不斷壓制，其結果則是「革命浪漫主義」的抬頭。當 1960 年代初，毛澤東通過以「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口號，取代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口號，重新掌握對現實主義文學的闡釋權的時候，文學話語闡釋的變化背後反映的則是中共領導人對中蘇關係的權力調整。

六、餘論：「解凍文學」在中蘇分裂及「新時期」語境下的表現

「解凍文學」是 1950 年代蘇聯意識形態轉變時期的重要現象，作為蘇聯文學的重要效仿者和譯介者，《譯文》適時加以回應、關注，從而形成了特殊時期的文化傳播現象。通過考察它的興起、發展與衰落這一譯介過程，我們可以注意到：第一階段《譯文》對「解凍文學」的少量譯介，亦體現了編輯部在文學與政治角力過程中，一方面需要迎合主流話語的政治需求，另一方面試圖體現作為譯介者對「主體性」的堅持，以譯介少量「解凍文學」這一翻譯策略在一元化體制內對主流意識形態作出有限的、隱形的「抵抗」與「消解」，而這種譯介策略到了《譯文》發展的第三階段開始顯性化與合法化。可以說，「解凍文學」在《譯文》的譯介過程始終與中蘇外交關係的發展密切相關。

1950 年代後期，中蘇關係變得非常微妙。從蘇共「二十大」開始，中蘇就已經在意識形態上開始出現分歧，但由於當時雙方的爭執都還局限在內部，雙方領導人暫時都不願將分歧公開化。正如汪暉所分析的：「社會主義陣營內的關

⁸² 周揚，〈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文藝報》5（1958），頁 4。

⁸³ 同上，頁 10。

⁸⁴ 指「干預生活」等作品的作者們。

⁸⁵ 同上，頁 11。

系不同於一般意義的主權國家關係。這個關係的內核是黨與黨的關係，從而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對於國家間關係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⁸⁶美國中情局亦認為雖然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使中蘇之間產生了新的分歧，但在反抗西方世界上，這些分歧絲毫不影響中蘇之間團結。⁸⁷因而在公開場合，中蘇「友好」與「團結」的表象仍被維持著。

1959年10月號，已經更名為《世界文學》的這份期刊，以「迎接偉大的十月革命節」的形式在開篇發表了4位蘇聯作家的詩歌和小說；在1960年2月份時，《世界文學》冠以大標題「慶祝偉大的中蘇同盟十周年」，並刊登了中國作協主席茅盾與蘇聯作協互致的賀電。同時翻譯了數篇蘇聯作家贊頌中國人民及其建設的詩歌。中蘇之間的一個重要分歧就是關於如何與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相處的問題。因而，在《世界文學》1960年2月所刊載的中蘇兩國作協互致的賀電中，茅盾突出的是兩國作家為「粉碎帝國主義一切妄想破壞中蘇偉大同盟的陰謀，為維護世界持久和平而繼續奮鬥」⁸⁸；而蘇聯作協理事會的賀電中，卻沒有提到任何關於如何應對帝國主義的問題，僅指出「我們今後還要以忘我和奮發的精神為我們兩國人民的福利服務」⁸⁹。很顯然，在這種表面上的中蘇友好、團結的氣氛，卻已經包含了兩國文壇此時對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具體目標的不同理解。

在這樣的譯介語境下，《譯文》（《世界文學》）進入了第三個發展階段（1958年8月號—1966年3月號）。可以想見的是，當中蘇出現分歧之時，「解凍文學」這些蘇聯文壇的異樣聲音便具有了消解甚至反抗蘇聯所理解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即大陸語境下的「蘇聯修正主義」）的特殊意義；如果對其加以譯介，並通過譯者、編者、評論家等譯入語系統中「專業人士」的「改寫」，完全可以扮演反「蘇修」的角色。但是，在新的發展階段中，「解凍文學」在這份期刊上完全消聲匿跡，並沒有像設想的一樣使「解凍文學」在譯入語語境中承擔起新的政治意義。這一現象的產生主要有兩點原因：

首先，雖然中蘇出現意識形態的分歧，但根據現有解密資料而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當時中蘇之間政策性分歧是不存在的，中蘇兩黨在很在程度上是在共同探討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問題，並沒有「嚴重的分裂」。⁹⁰汪暉亦指出：「一般來說，中蘇關係肇始於蘇共二十大，到1960年伴隨著論戰的公開化而為世界所知。但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解密檔案，即便在中蘇論戰的語境中，美國情報機構仍然認為中蘇同盟並未真正破裂。」⁹¹美國中央情報局在1959年的一份備忘錄中也提到：中蘇之間將不會出現根本性分歧，這是必然的。⁹²從目前的解密資料可以查閱到，美國情報機構針對中蘇關係第一次使用「公開破裂」（open spit）一詞是1963年7月。⁹³所以，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這種

⁸⁶ 汪暉《短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與政治的邏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頁130。

⁸⁷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umber 13-2-59, *Present Trends in Communist China*, Conclusions 4, February 10, 1959.

⁸⁸ 〈中國作家協會主席茅盾給蘇聯作家協會第壹書記費定的賀電〉，《世界文學》1960:2（1960.2），頁13。

⁸⁹ 〈蘇聯作家協會給中國作家協會的賀電〉，《世界文學》1960:2（1960.2），頁13。

⁹⁰ 具體分析見沈誌華《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1956—1957年的中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頁82—84。

⁹¹ 汪暉《短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與政治的邏輯》，頁253。

⁹² CIA, Memorandum, *Sino-Soviet Relationship*, September 18, 1959.

⁹³ CIA, Memorandum, *Implications of the Sino-Soviet Rupture for the U.S.*, July 18, 1963.

意識形態的譯介語境是很難容許放大「解凍文學」這種「異樣」的聲音，一方面可能對自身的主流意識形態再次構成衝擊，另一方面，使其扮演反「蘇修」的角色意義不大。

其次，進入第三階段的《譯文》（《世界文學》）其譯介重點發生了改變。在中蘇分裂之前，「中共已經從一個在莫斯科指揮下的支部成為與蘇共並列的國際共運的領導者和理論權威」⁹⁴。美國情報機構當時分析道：中國自身力量和自信心的不斷增強，增加了中國在處理中蘇關係中的魄力，導致中蘇關係分歧的急劇增加，並同時使中國對前途的展望與態度投向了非共產主義世界。⁹⁵可以說，在新的國際國內形勢下，中國對民族國家地位進一步反思後，已然將民族國家形象置身於更為廣闊的空間，不僅視自己為社會主義陣營內的一支領導力量，更將民族國家的視野突破了社會主義陣營的範圍而擴大至兩大陣營間的諸多「中間地帶」國家，並且要自覺地擔當起「世界革命」的重任，亦與蘇聯展開對「第三世界」影響力的爭奪⁹⁶。從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始，蘇共的整體形象「黯然失色」，而「中共和毛澤東的地位則蒸蒸日上，其影響所至，不僅遍及亞洲，而且擴大到歐洲」⁹⁷，國際共運系統的領導原則由「以蘇聯為首」客觀上變了「以中蘇為首」⁹⁸；1960年11月81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最重要的進展」即是中國共產黨對蘇聯領導地位的「挑戰」⁹⁹。因而，1950年代末期，正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生變革之際，也恰是中共領導人的「世界觀」發生重大改變之際——當然這種新的「世界觀」的形成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此時，在新世界觀的視野之下，《譯文》開始將譯介的目光大規模、集中性地集中到「中間地帶」國家時已是題中應有之義，亞、非、拉國家文學在占據了翻譯文學系統中心位置後，成為了意識形態操控下的「經典化」文本。

「解凍文學」再次在譯入語境中發揮作用要到1970年代末「文革」結束、中國大陸「改革文學」的出現。此時，中國社會再次處於歷史轉折時期，文學應該如何「表現和推動時代發展」，如何表現「人們的真實的精神處境」，如何「通過文學作品形象地概括出這個時代的精神高度」，¹⁰⁰成為當時作家需要

⁹⁴ 沈誌華《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1956—1957年的中國》，頁228。美國情報機構指出：自斯大林去世之後，中國在共產主義世界的影響力急劇增加，在共產主義陣營裏扮演了突出角色。（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umber 13-57, *Communist China through 1961*, Discussion 40, March 19, 1957.）

⁹⁵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umber 100-3-60, *Sino-Soviet Relations*, Conclusions 1, August 9, 1960.

⁹⁶ 在斯大林統治蘇聯後期（1946—1953），蘇聯對「第三世界」的關注始終處於次要地位。但自赫魯曉夫上臺之後，開始加大對「第三世界」軍事、經濟援助（1958—1960），並於1961—1964年達到高潮，以此抗衡西方世界。（可參考 Stephen T. Hosmer, Thomas W. Wolfe, *Soviet Policy and Practice toward Third World Conflicts* [Toronto: Lexington, 1982].）可以說，在這一點上蘇聯的政策與中國壹致，隨著中蘇分歧加劇，兩國對第三世界影響力與領導力的爭奪成為必然。

⁹⁷ 沈誌華《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1956—1957年的中國》，頁228。

⁹⁸ 同上，頁256。一明顯例證即是「波匈事件」後周恩來的穿梭外交取得巨大成功，提出了中國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地位 and 影響。1957年蘇聯官方文件列舉的社會主義國家將「蘇聯和中國排在首位，其他國家是按字母次序列出的」。中共威望已經與蘇共齊名，成為各國學習的榜樣。（沈誌華《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1956—1957年的中國》，頁274.）

⁹⁹ CIA, Office of Current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Study, *The Sino-Soviet Dispute (The 6 December Declaration, and Soviet and Chinese Presentations of It)*, March 17, 1961, p.iv.

¹⁰⁰ 梅疾愚、程戈，〈表現時代與叩問靈魂——對「改革文學」的回顧與反思〉，《時代文學》1997:3（1997.6）：頁139。

思考的問題。我們可以從當時「改革文學」體現的幾點重要特徵發現其與「解凍文學」具有內在的直接對應關係：其一，作品敢於觸及重大社會問題，包括政治與經濟體制、地方保護主義、「左」傾主義等；其二，緊扣文學與現實生活的密切關係，努力表達人們對社會的要求；其三，注意人物形象的刻畫，特別強調社會矛盾和尖銳衝突。¹⁰¹曾經在 1950 年代對「解凍文學」在大陸的傳播扮演過重要角色的《人民文學》亦在復刊之後發表了諸篇「改革文學」作品。那麼，在新的譯介語境下，哪些「解凍文學」文學作品是首次被翻譯進來？哪些是重譯？為什麼選擇這些譯作？「解凍文學」具體對「新時期」哪些作家的「改革文學」作品產生了影響？這些影響哪些是寫作技巧層面的？哪些是價值觀念、社會意識層面的？處在搖擺、過渡期的主流意識形態對「解凍文學」再次發揮作用的態度怎樣？均是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的課題。

主要參引文獻：

一、中文

（一）專書

出版社，2000 年。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

王宏志，《歷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

王宏志主編，《翻譯史研究 2011》，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年。

向繼東主編，《新啟蒙年代：我的 80 年代閱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

李巧寧，《新中國的中蘇友好話語構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汪暉《短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與政治的邏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

沈誌華，《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1956—1957 年的中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

洪子誠，《1956 百花時代》，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 年。

埃娃·湯普遜著，楊德友譯，《帝國意識：俄國文學與殖民主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

陳建華，《二十世紀中俄文學關係》，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黎皓智，《20 世紀俄羅斯文學思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

譚得伶，《譚得伶自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二）期刊論文

《譯文》（《世界文學》），1953 年 7 月號—1958 年 7 月號 1953:7 (1953.7)—1958:7 (1958.7)。

「編者的話」，《人民文學》，1957 年 10 月號 1957:10 (1957.10)，頁 29—30。

「編者的話」，《人民文學》，1956 年第 4 期 4 (1956)，頁 126。

「編者按」，《人民文學》，1956 年第 4 期 4 (1956)，頁 1。

本刊記者，〈辦好文學期刊，促進「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藝報》，1956

¹⁰¹ 同上。

- 年第 23 期 23 (1956), 頁 20—21。
- 瓦·奧維奇金,〈談特寫〉,《文藝報》,1955 年第 7 期 (1955), 頁 36—39。
- 李明濱,〈蘇聯五十一六十年代中期的文藝政策及其對文學創作的影響〉,《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1984 年第 2 期 (1984), 頁 52—59。
- 周揚,〈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文藝報》,1958 年第 5 期 (1958), 頁 2—14。
- 孫秉富,〈批判「人民文學」七月號上的幾株毒草〉,見《人民文學》,1957 年 10 月號 1957:10 (1957.10), 頁 32—34。
- 梅疾愚、程戈,〈表現時代與叩問靈魂——對「改革文學」的回顧與反思〉,《時代文學》1997:3 (1997.6): 頁 137-140。
- 郭沫若,〈向蘇聯文藝看齊〉,《文藝報》,1957 年第 30 號 30 (1957), 頁 2—3。
- 劉甯,〈「今天的作家應當成為哲學家」——列昂諾夫訪問記〉,《世界文學》1987 年第 2 期 2 (1987), 276—291。
- 穆薩托夫著、李祿譯,〈蘇聯與匈牙利事件: 新的檔案資料〉,《近現代史》,1993 年第 1 期 1 (1993), 轉自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812/17/7449569_139909584.shtml。
- 蘇聯「共產黨人」雜誌專論〈關於文學藝術中的典型問題〉,《文藝報》,1956 年第 3 期 3 (1956), 頁 44—51。

二、英文

- Deming Brown. *Soviet Russian Literature since Stalin* (Cambridge: Polity, 2009)
- Deming Brown. *Soviet Russian Literature since Stal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 Geoffrey Heskl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Search of New Way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edited by Charles A. Moser. New York: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92, pp.520-594.
- John Gittings. *Survey of the Sino-Soviet Dispute: A Commentary and Extracts from the Recant Polemics 1963-196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John H. Plumb. *The Death of the Pas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9).
- Maria Tymoczko and Edwin Gentzler. *Translation and Power*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and Teaching Press, 2007).
- Rudolf G. Wagner. *Inside a Service Trad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rose*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 Stephen T. Hosmer, Thomas W. Wolfe, *Soviet Policy and Practice toward Third World Conflicts* (Toronto: Lexington, 1982)
- Victor Terras,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Era of Socialist Realism, 1925-53,"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edited by Charles A. Moser. New York: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92, pp.458-519.

三、外交檔案

- CIA, Memorandum, *Implications of the Sino-Soviet Rupture for the U.S.*, July 18, 1963.
- CIA, Memorandum, *Sino-Soviet Relationship*, September 18, 1959
- CIA, Office of Current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Study, *The Sino-Soviet Dispute (The 6 December Declaration, and Soviet and Chinese Presentations of It)*, March 17, 1961.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umber 100-3-60, *Sion-Soviet Relations*, Conclusions 1, August 9, 1960.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umber 13-2-59, *Present Trends in Communist China*, Conclusions 4, February 10, 1959.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umber 13-57, *Communist China through 1961*, Discussion 40, March 19, 1957.